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一〇五期
2026年5月　　頁91~128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2605_(105).03

「孔氏經讖」撰作時段考——歷時語境中的若干常用史料再審視*

郭　思　韻**

摘　要

文中就可體現「經讖」系列行世問題的史料重予辨正，以見其形成年代恐當推遲至建武：李尋「六緯」的內涵縱與儒學相關亦不得等同「經讖」；張霸「百兩篇」雖被證偽但流傳未絕，未可斷論採說之「經讖」源出當時；楊氏「秘記」乃河洛天文推步之屬；《華陽國志》「漢史案圖緯」一段係隋唐人竄入；張衡「成於哀平之際」的依據只適用於斷代上限；《後漢書》「惲據經讖」一句乃范曄增飾，同書所載篇名亦其取相副者補述；蘇竟「孔丘秘經」乃就「秘隱」、「藏設」的「河洛世表」而言，亦桓譚稱「或收古之圖書，增益造飾，稱孔子並為讖記」者，光武駁書之「西狩獲麟讖」即其「漢錄」部分；此皆帝紀世讖之流，仍不同於《圖讖》中存世「經讖」系列的內容性質。

關鍵詞：讖緯發展史　河圖洛書　經讖　西狩獲麟讖

2025.06.17 收稿，2026.03.11 通過刊登。

* 本研究獲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先秦兩漢河洛讖緯的歷時嬗變及其書寫體現研究」（批准號 24YJAZH002）、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研究基金項目“Research on Hetu, Luoshu and Jingchen in Diachronic Contexts”（編號 XMUMRF/2023-C12/IART/0020）資助，初稿曾宣讀於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古籍所聯合主辦，安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安徽師範大學社科聯承辦的「第十一屆中國古文獻與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 年 11 月 5-6 日，蕪湖）。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悉心雅正，謹申謝忱。

** 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中文系副教授。Email: suin_koay@fox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Study on the Period of Composition of Canonical Confucian Prophetic Texts: A Reappraisal of Frequently Referenced Historical Sources in Diachronic Contexts

Koay, Su-in *

Abstract

This paper re-examines historical sources concerning the circulation of "Classic-Prophecy" (經讖) texts and re-evaluates their chronological development by suggesting that their formation likely dates no earlier than the Jianwu period. To begin with, although Li Xun's "Six Wei" is related to Confucian thought, it cannot be equated with the "Classic-Prophecy" tradition. While Zhang Ba's *Bailiang Pian* has proven to be a forgery, it continued to be in circulation and should not be definitively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beliefs associated with "Classic-Prophecy." Meanwhile, the "Secret Records" passed down by the ancestors of the Yang family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He-Luo texts of astronomical calculation of ephemerides. Next, the section on "Han Historical Charts and Apocrypha" in *Huayang Guozhi* was likely inserted during the Sui-Tang period. The claim that prophetic involvement was "formed during the Ai-Ping period," as stated by Zhang Heng, can only be understood within a diachronic framework. Moreover, the statement in *Hou Hanshu* that Zhi Yun relied on "Classics and Prophecies" was likely embellished by Fan Ye, who also complemented several chapter titles by referencing texts within their corresponding historical contexts. As Su Jing's assertion of Confucius's "Secret Scripture" refers to the genealogy of the He-Luo systems that has been "hidden and stored," it also correlates with Huan Tan's critique that the ancient writings were forged and wrongly ascribed to Confucius's prophetic records. Lastly, the "Western Hunt and Kylin Prophecy," rejected by Emperor Guangwu, concerns the records of Han and belongs to imperial prophetic narratives; however, it is fundamentally distinct from the series of Classic-Prophecy texts included in "Charts and Prophecies" (圖讖).

Keyword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en-Wei, He-Tu Luo-Shu*, Classic-Prophecy, Kylin Prophec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
Email: suin_koay@fox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緒論

讖緯研究近來雖已有長足發展，諸多課題頗多創獲，然而在發展史此一最為根本的問題上，仍有待推進。自1935年姜忠奎《緯史論微》研討「讖緯之興」歸納出「以時代為斷者」十種、「以人物為斷者」十六種及「以典籍為斷者」四種舊說以來，[1]學者所議大抵不出其範疇。單就具體的「成書」——讖緯文獻的形成時段而言，迄今仍多止於約略總括為「形成於漢成帝時，後又經過哀、平、新三朝發展，至光武帝時整理定型為圖讖八十一篇」[2]的籠統說法。這個困境，頗大程度是由於將讖緯文獻視作一個整體並且混合學科來進行考索之故。

基於建武時期（25-56）官方的校編與宣佈，《圖讖》諸作遂往往予人一種類似於套書的印象，張衡（78-139）稱「一卷之書」[3]即其體現，在「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4]此一深入人心的共有身份下，眾篇被看成是互補的整體，進而被界定為意圖相近、脈絡相通甚至同期的造作，可說是很自然的事，亦歷來學界的主流觀點。但在漢代當時，就大的流別而言，《圖讖》諸篇實被劃為「《河》、《洛》」與「經讖」二支，故張純（?-56）撰〈泰山刻石文〉將讖緯載錄、表彰光武（5 B.C.- 57 A.D.，25 B.C.-57 A.D.在位）天命的情況稱頌為「《河》、《洛》命后，『經讖』所傳」，[5]張衡上事亦有「《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之語。[6]可儘管1948年陳槃（1905-1999）就已力持「諸讖緯之屬，《河圖》、《洛書》之出在先，……由《河圖》、《洛書》更滋生《易》、《書》、《詩》、《禮》、《春秋》之等讖緯」的說法，[7]但此後學界

1 姜忠奎著，黃曙輝等點校，《緯史論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卷 1，頁 18-37。

2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上）》，董治安主編，《兩漢全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第 33 冊，頁 18769。

3 漢・張衡，〈請禁絕圖讖疏〉，張震澤，《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361。

4 梁・劉勰，《文心雕龍・正緯》，詹鍈，《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 1，頁 103。

5 晉・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志第 7，頁 3166。

6 《後漢書・張衡傳》李賢注引《衡集》上事。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 59，頁 1913。

7 陳槃，〈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6 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7），頁 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固無異議，卻依舊延續著以眾篇為整體來綜合研討其共性的路子。這固然有習慣使然的緣故，實也與存世讖緯作為「很長時間內、經由眾人之手完成的，並且在幾次被禁止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錯亂以及相互混入」[8]的輯佚文獻所造成的研究障礙有相當的關係。

2000年黃復山曾就「『經讖』稱引《河》、《洛》事例」等詳加整理，以「經讖明引《河》、《洛》篇名者，斑斑可見，而《河》、《洛》則絕無引用經讖之篇名者」著力再證「《河》、《洛》撰定在先，經讖成書在後」；[9]後徐興無從文獻形式著眼，論斷兩者的起源年代上限：「《河》、《洛》為出現於秦漢之間的早期讖緯文獻形式，其中儒家思想的色彩淡薄。『七經緯』則晚於《河》、《洛》，產生於西漢五經被確立為官學之後，是以經學附庸的面貌出現的讖緯文獻形式。」[10]雖皆進一步鞏固、充實了前說，但因尚未於時局世變中系統梳理論證其流別嬗變，故十餘年來，包括愈見興盛的文學視角，《河》、《洛》與「經讖」的性質區別及階段性發展，仍無法獲得足夠重視，也尚難被真正借重，依然多以「讖緯」的總概念來審視。

近十年，余嘗對此二支的發展階段及內容特點詳加考論，主張官定《圖讖》「撇開個別篇章，……《河》、《洛》系列的流播得力於王莽的推動，旨在通過古史帝王之事確立、統合五德符命體系及譜系；『經讖』系列則得力於光武君臣，欲援《河》、《洛》為說，闡經互證以正名、強化、渲染『孔為赤制』說與〈赤伏符〉的分量。彼此各有重心立場」，其中前者「致力將讖類內容升格為河洛所出的『天文』，走的是『符命』路線，強調『本之於天』」，後者則「致力將孔子摻入圖讖體系中承擔傳揚重任的緊要角色，……走的是『師法』路線，強調『參之於聖』」。[11]然而這些立論，因未對歷來用於判斷讖緯文獻形成年代、解讀結果與上述觀點看似相悖的一系列常用但也常易處理不周的史

8 〈關於《河圖》、《洛書》〉，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上冊，頁 77。

9 黃復山，《東漢讖緯學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頁 82-92。

10 徐興無，《讖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構建》（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20。

11 郭思韻，〈「孔丘秘經」與新莽《符命》及「圖讖」統合〉、〈「孔丘秘經」與經、讖合流及光武《圖讖》〉，《漢代讖緯研究——以淵源流變、內容構成及對文史寫作的影響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傅剛先生指導，2013）；郭思韻，〈讖緯、符應思潮下「封禪」體的與時因變——以《文選》「符命」類為主線〉，《文學遺產》2016 年第 2 期，頁 31；郭思韻，〈讖緯文獻中的「圖讖史」建構及孔子與「河洛圖書」之關係遞變〉，《淡江中文學報》第 40 期（2019 年 6 月），頁 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料，予以對話、辯駁，不免留下較多爭議空間，說服力有待補足。

從《河》、《洛》獨擅到「經讖」風行，「孔氏經讖」的出現，可謂是「圖讖」領域發展史中極其關鍵的轉折與嬗變，對其成篇時限乃至時機加以定位，無疑具有重要意義。而在相關的探討中，有若干史料是常被學者們倚重的，是後人認為「經讖」在當時甚至更早便已面世的要因，但實情頗可商榷。究其緣由，或與前賢在材料使用上的未甚區別史料、語料有相當關係，致使某些時候不免有微妙落差。

歷來文史研究者，對待古籍材料，大抵著眼於可信與可靠兩大基本要素，繼而納為史料以資論證，其間甚少慮及語料因素。然而歷史材料、語言材料固有相通之處，其本質區別亦不容忽視。以讖緯研究淵源最深的三部史籍為例：《漢書》載錄著西漢的史料，但作為語料卻當係於東漢班固（32-92）；《後漢書》載錄著東漢的史料，但在語料繫年上則更多取決於劉宋范曄（398-445）；《東觀漢記》載錄的東漢史料乃時人所著，則係兼為東漢語料。史料、語料的斷代原則有所不同：前者基於載錄對象，著眼的是文字裡的彼世人事；後者基於行文作者，體現的是書寫人的當代表述。此二者在文獻使用上的不加區分，對於具體人、事方面的尋繹，誠然通常不造成影響，但之於牽涉了具歷時特徵概念的某些課題而言，卻頗易落入失之毫釐的困境。

讖緯研究，由於最基礎的名義——諸如「讖」、「緯」、「經讖」、「讖緯」、「圖讖」、《圖讖》等，其稱謂與內涵頗經一番歷時嬗變，致使追述語辭與當初實情偶有微妙落差，遂在此問題上體現得極其顯著，極易引發誤判。且以古今學人各舉一例。如清末學者蔣黼（1866-1911）為其父蔣清翊（1866-1911）之《緯學源流興廢考》作注時，曾批評范曄行文不當，就《後漢書・張衡傳》所載的「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複附以訞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請禁絕圖讖）」，[12]他如是指責：「平子疏中但言圖讖之非，無一語病緯者，而上云『衡以圖緯虛妄』，蓋史之失詞耳。當云『衡以圖讖虛妄』，方與疏意相合。」[13]這實際便是典型的混淆語料史料概念而造成的疏失。蔣黼未察張衡時代尚未有「圖緯」一稱而皆曰「圖讖」，范曄時期則兩者早可互辭，故他所質疑的「史之失詞」問題並不存在，所澄清的「但言圖讖之非，無一語病緯」更完全失實。這番由毫釐之差到千里之謬的所謂匡誤，令我們看到語料與史料之間確有所區別且在某些時候務須辨明，不能貿然

12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張衡傳〉，《後漢書》，卷 59，頁 1911。

13 清・蔣清翊著、蔣黼注，《緯學源流興廢考》，卷中，姜忠奎，《緯史論微》，附刊，頁 4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將史家所措文辭當作書中時代的語言概念。再如以「緯」稱「讖」具體起於何時的課題，陳槃嘗據〈小黃門譙敏碑〉稱述譙贛（?-?）的「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14]推論「『緯』之稱，大抵可能早推至於昭、宣之世」，[15]唯此材料實則僅足以證以「緯」稱「讖」的現象不晚於碑文的最早寫作年份——靈帝中平四年（187），而不得就由上推到譙氏活躍的「昭、宣之世」的用語。張峰屹曾就唐以來學界對讖緯名義的研究作出反思，認為應當充分考量「漢代人在語言實踐中如何使用它們」，[16]實際就方法學而言便是要明辨史料、語料，從而避免這類將史料當語料運用的失誤，在不自覺中偏離事實。前引二例也已足證，語料、史料的問題如未能妥善處理，確實會對研究形成妨礙，誠須慎重對待。

就讖緯課題而言，歷時語境、語料的概念與意識，諸多史料、語料的辨識與釐清，有助於更立體地直面兩漢之際人們的當下認知與讖緯的本然狀態，而不至過多受到後世視角左右，或把不同時段的概念觀點等閒混淆。故本文竊不自量，嘗試從歷時視角，由微觀構築宏觀：就可體現「經讖」形成時機的若干常用但也常易處理不周的史料，適當結合語境因素與語料元素，逐項重予審視、辨正，間亦藉以尋繹兩漢之交的圖讖領域中，與「經讖」有密切關聯的時間節點與發展痕跡，窺其各個階段的情狀與轉變之大略，探討「經讖」蜂出的轉捩點，從而證其形成年代之宜當推遲至建武時期，以備一說。

應當說明的是：首先，本文致力的是光武官定《圖讖》轄下三十六篇「經讖」的造作時段研究，乃以具體且特定的作品為固定目標的撰著年代考證，而非以讖緯學科的思想淵源或該領域內的一應作品為對象。故文中的考察，是以名分上矯託孔子（511 B.C.-479 B.C.）經手的官定《圖讖》諸篇及其有所淵源的著述與發展脈絡為基礎，個中「經讖」作品的成型為核心的，而不旁及其他雜讖，也並不針對「讖」或「緯」做概念上的溯源。（按：將驗證的預言稱之曰讖，《史記・趙世家》已見載，讖驗觀念的出現遠要更早；輔經之緯則近乎與經學時代同啟，但推闡論說、衍及旁義的作風同樣往上得見；占術與經術的關聯化思路，漢初以來今文經學已在所不鮮，至董仲舒（約179 B.C.-約104 B.C.）其風尤熾；[17]此類之屬並非本文所擬處理的問題。）其次，本文藉助漢語史語

14 宋・洪适，《隸釋・隸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11，頁 126。

15 陳槃，〈讖緯釋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1 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3），頁 307。

16 張峰屹，〈歷史維度的缺失——自唐迄今讖緯名義研究之述評〉，《文學與文化》2010 年第 2 期，頁 93。

17 詳張峰屹，〈兩漢讖緯考論〉，《文史哲》2017 年第 4 期，頁 19-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料學的方法，置史料於歷時語境的框架中研究，將記述者的行文與被記述者的原文區分開來，考察各自說法的當下實質與歷時變化。所再審視的一系列史料，著重擇取常用於斷限「經讖」撰作年代者。這之中，涉及語料因素的誠然不少，但也有個別雖與此關係不大，卻存在商榷空間，且放入文中歷時語境框架中有助於釐定課題關鍵，尤其是撰作時間上限的，則一併予以研討。末了，儘管《後漢書》素為讖緯研究最常倚重的史籍，《隋志》、《四庫總目》等莫不據以立論，但因范氏著史時「對原有材料多加潤色，改動原文」[18]的開創性做法，本文基於語料因素審慎以對，擇從標準亦將與一般史料的考量原則略有區別。

二、讖緯相關名義問題與本研究的用語

為免以今律古、以後律前，本文通篇將沿用兩漢之際時人之原本觀念，使用讖緯相關名謂。惟由於其存在著多種指涉相近、義界模糊的概稱，為便於後文精確論述，有必要在進入正題之前，先就本研究相涉的「讖」、「緯」、「經讖」、「讖緯」、「圖讖」、《圖讖》諸概念，略作辨析。

且先辨明概括性較強的「讖緯」、「圖讖」、《圖讖》。「讖緯」誠然是今人研究中最常用的概念與稱謂，實則卻是個後起的名目，始見於蔡邕（133-192）〈敘樂〉的「世祖追修前業，采讖緯之文」及隨後《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劉備群臣上奏勸進之言。[19]而在此之前，漢人的語境中，對官方發布的八十一篇讖緯作品，凡統言之皆稱「圖讖」，張衡上疏「收藏圖讖，一禁絕之」、[20]賈逵（30-101）條奏「《左氏》與圖讖合者」[21]等皆可證，疑東漢初官定時即如此題之，是所謂「宣布《圖讖》於天下」，[22]衡、逵之文實則俱應標上書名號。《圖讖》之得名，或從西漢末平帝元始四年所徵召之「圖讖」學藝門類沿襲而來。[23]亦即，「圖讖」是學科概念，《圖讖》則特指漢光武於中元元年（56）頒行於天下之八十一篇合集名，也即現今一般意義上所說的、明清以來輯佚家致力鉤沉的讖緯原始文獻。由於「讖緯」一稱係屬後起，在特定語境中與原始名謂「圖讖」或《圖讖》的

18 詳內藤湖南著，馬彪譯，《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14-115。

19 鄧安生，《蔡邕集編年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 598-599。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71），卷 32，頁 888。

20 漢・張衡，〈請禁絕圖讖疏〉，張震澤，《張衡詩文集校註》，頁 362。

21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賈逵傳〉，《後漢書》，卷 36，頁 1237。

22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光武帝紀〉，《後漢書》，卷 1，頁 84。

23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王莽傳〉，《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99，頁 40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內涵有著微妙不同，尤其「緯」還與「經」在概念上有深厚淵源，倘以此觀照、梳理其於兩漢之際的發展歷程，對實情的反映恐不免有差之毫釐的弊端。故本文將沿用彼時漢人之原本觀念，捨「讖緯」而以「圖讖」作為相關領域及其著述的泛稱，《圖讖》則專指官定八十一篇之作。

復次，關於「讖」、「緯」、「經讖」。傳統學界對讖緯名義較多的討論，莫過於狹義層面的「讖」與「緯」之間的異同問題，分為「異實」與「互辭」二說。「異實」之論肇於《隋志》，經胡應麟完善而最終定調於《四庫提要》；「互辭」之論至清始出，以王鳴盛（1722-1797）為先聲再經俞正燮（1775-1840）、顧頡剛、陳槃等確立了「先有讖稱，緯名後起」說，並最終隨著學人考證出以「緯」稱「讖」的大略起始年代而晉為的論。[24]大抵上，蔡邕〈李休碑文〉以前，未嘗見有將《圖讖》中隸屬「六藝」系列者稱之曰「緯」的例證；再往上推至張衡時，其奏疏亦一概稱之曰《春秋讖》、《詩讖》，而把《河圖》簡稱「圖」；[25]而回到《圖讖》成型的兩漢之際，建武三十年張純為封禪盛事而撰的〈泰山刻石文〉明確將讖緯文獻載錄、表彰光武天命的現象稱頌為「《河》《雒》命后，『經讖』所傳」。[26]可以清晰看到，儘管東漢早期的《圖讖》確如前引張衡「《河》《洛》五九，『六藝』四九，謂八十一篇也」所言分為兩支，但彼時並沒有所謂「讖」或「緯」的區別性概念，三十六篇攀附「六藝」之作從一開始就是以「讖」為

24 唐・魏徵等，〈經籍志〉，《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32，頁 941。明・胡應麟，〈四部正訛〉，《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卷 30，頁 295。清・紀昀總撰，〈易緯坤靈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卷 6，經部六易類六，頁 184。清・王鳴盛，〈讖緯〉，《蛾術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卷 2， 說錄二，頁 46。清・姜忠奎，《緯史論微》，卷 1，頁 13。陳槃，〈讖緯釋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1 本，頁 300。陳槃，〈讖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1 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8），頁 41。陳槃，〈論早期讖緯及其與鄒衍書說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本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8），頁 186。張峰屹，〈歷史維度的缺失——自唐迄今讖緯名義研究之述評〉，頁 93。黃復山，《漢代《尚書》讖緯學述》，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4 編第 11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頁 303。郭思韻，《漢代讖緯研究——以淵源流變、內容構成及對文史寫作的影響為中心》，頁 190。

25 漢・張衡，〈請禁絕圖讖疏〉，張震澤，《張衡詩文集校註》，頁 361。

26 晉・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志第 7，頁 31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名、作為「經讖」立足的，而並非後人慣說的「緯」。建寧、熹平以下逐漸常見的「緯」稱，反映的是晚漢士人對「經讖」的見解，卻不代表這就是兩漢之際「圖讖」領域的實情。而況「經讖」一名，與著述之「緯」，在截至東漢前期的語境中，於作者、時代、地位方面的界野仍是有出入的。如班固謂《漢書》「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自認有「緯」六經之實，其〈幽通賦〉的「登孔、顯而上下兮，緯群龍之所經」亦取此意，即孟康（?-?）所謂「聖人作經，賢者緯之」。[27]「經」、「緯」之間主次分明，「緯」作為輔翼是後人所可共襄的事業。但「經讖」之為名——與「經」咬合、以「讖」自詡，是基於以其為「下知千年」的「聖人長見」成果。這不僅和把它署為孔氏之作的行徑息息相應，也直觀地體現了「經讖」系列造作之初的原生主題，實與漢世士人所好、明顯為闡經張目的「緯」之名義有著不同的初衷與側重。故為避免以今律古，期能更準確地還原、窺見當時的發展與嬗變，遂亦沿用彼時漢人之原本觀念，捨「緯書」而以「經讖」指稱《圖讖》中隸屬「六藝」系列之作。

最後，關於《圖讖》中的兩大系列及其內容特性。從大的流別來說，《河》《洛》與「經讖」間有著作者群體、內容特性、形成時段及時代地位之別；而小的方面，《河》《洛》內部有「正文」與「演文」之分，「經讖」內部也不乏看到沿自不同經書派別而來的不同立場。就內容而言，《河》《洛》的「正文」之篇傳為歷代聖王者通過「河龍圖發，洛龜書感」[28]的「沉璧河洛」儀式所得，因被目為上天授予的符命而有「天文」別稱；「演文」之篇則號稱出自「九聖」的積累，其內容主要用於鞏固、佐證「正文」，主要包括對「正文」的闡說、歷代聖王在黃河、洛水進行的《圖》《書》授受儀式乃至感生、異表、興亡徵符等以五德籙運為中心的禎命體系與譜系，另有古史地理、天文災異等內容。孔子在該系列的存世文獻中，實際只出現過兩次，一則見其熟通《河》《洛》，一則展現其角色仍只停留在獲麟瑞為聖王作《春秋》的今文學派舊說。[29]至於「經讖」系列，其與《河》《洛》最直觀的區別無疑是多處可見的闡經內容，但這泰半出於對傳世今文經說的直接汲取，包括其中與占術關聯的解經途徑。真正隸屬「經讖」的創發性內容，在其套用了《河》《洛》系列的幾乎整個思想體系並將之推演、發揮到各所著重的其他目標上造作新說，[30]而這是以孔子為核心輻射開展的，

27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敘傳〉，《漢書》，卷 100，頁 4271、4224。

28 鄭傑文等整理，〈春秋說題辭〉，《兩漢讖緯文獻（下）》，董治安主編，《兩漢全書》第 34 冊，頁 19429。

29 郭思韻，〈讖緯文獻中的「圖讖史」建構及孔子與「河洛圖書」之關係遞變〉，頁 66-68。

30 郭思韻，〈《圖讖》中《河》《洛》的內容體系與「經讖」的取資發揮〉，馬來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涵蓋了大量正名、強化、渲染孔子「陳敘圖錄」「為赤漢制」，且還在來歷上躋身為所謂的「孔聖奉天之文」。[31]本文所擬研究的，正是此一冒為孔氏所著的「經讖」系列，究竟發軔於何時，形成於何境。

茲試論於下，尚祈方家指疵。

三、西漢史料兼語料三則
——未可用以證「經讖」系列行於西漢

與「經讖」系列問世年代判斷有關、常用於證其行於西漢的五則西漢史料中，成帝時期（33 B.C.-7 B.C.在位）李尋（?-?）的「五經六緯」說、張霸（?-?）所獻偽《尚書》的「百兩篇」構成以及楊春卿先祖的「秘記」著述，是最不容迴避的三項文獻證據——它們兼為當其時的語料，乃是未受後世成見、成辭所局限或左右的本然狀態。這意味著當時確實存在著與經術有關的「六緯」概念、「百兩篇」的《尚書》形態以及疑與圖讖關係密切的「秘記」著述，則所需考辨的關鍵，便純然在此三者各與「圖讖」乃至「經讖」之具體關係的有無深淺。以下分別論之，以見其未可用以證「經讖」系列行於西漢。

（一）成帝時李尋「五經六緯」說

《漢書》本傳載成帝時期李尋嘗說王根（?-6 B.C.）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32]文中李尋所稱「五經六緯」之「緯」的具體所指，學界主要分成兩派：一是以其為緯經著述，專就讖緯文獻中的「經讖」系列而言，孟康、張晏（?-?）、顏師古（581-645）持此說，近人李學勤（1933-2019）等亦然；一則以其為天文星象，劉攽（1023-1089）、姚鼐（1732-1815）、王先謙（1842-1918）持此說，近人顧頡剛（1893-1980）等亦然。

然而應當辨析的是，人文、天文二說無論何者為是，實際上都未足以證「經讖」在彼時已然行世：苟所指為「星象」，則自與「經讖」無涉；而即便果如李學勤所言「『五經六緯』在李尋心目中已經是儒學的基本內容」，但就此推

亞漢學研究會編，《漢學與傳統文化：第十一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金寶：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2017），頁 43-66。

31 晉・司馬彪，《續漢書・律曆志》，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志第 2，頁 3026、3039。

32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李尋傳〉，《漢書》，卷 75，頁 31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為「這也就是說，在成帝時諸緯業已大備，緯書[33]的起源肯定更早」，[34]也仍是失之武斷的——因為「緯」和「經讖」之間並不能貿然劃等號。就語料呈現的詞義發展史而言，誠然「緯」稱在東漢後期幾為「經讖」壟斷，但在李尋身處的西漢晚期，這一關係尚未締結。

早期的所謂「緯」，正如四庫館臣所指出的，「秦漢以來，去聖日遠，儒者推闡論說，各自成書，與經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書大傳》、董仲舒《春秋陰陽》「核其文體，即是緯書」，[35]「緯」並不是一個專門為「經讖」所新造的術語，而與「經」一樣只是地位性質的界定，例如班固就曾自詡《漢書》「緯六經，綴道綱」，又作〈幽通賦〉云「登孔顯而上下兮，緯群龍之所經」。[36]用為名詞，「緯」本泛言諸輔經以綴道綱的著述，故反對「緯書」為孔子所作的荀悅（148-209）亦有「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的表達，[37]此「緯」便顯然與「經讖」無涉。稽考漢世語料，明確以「緯」指稱「經讖」，最早見於永壽年間（155-158）蔡邕所作〈李休碑文〉，[38]建寧（168-172）、熹平（172-178）以下才較為常用。[39]此前自李尋以下逾百五年未嘗一見，倘將其「六緯」釋作

33 按：此處緯書特指「經讖」之屬而非《春秋繁露》之流。可參閱李學勤，〈《易緯・乾鑿度》的幾點研究——兼論帛書《周易》與漢易的關係〉，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第 1 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 24-25。

34 李學勤，〈《漢書・李尋傳》與緯學的興起〉，《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6 年第 2 期，頁 2。

35 清・紀昀總撰，〈易緯坤靈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6，經部六易類六，頁 184。

36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敘傳上〉，《漢書》，卷 100，頁 4271、4224。

37 漢・荀悅著，明・黃省曾注，〈政體〉，《申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 1，頁 4。

38 按：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鄧安生《蔡邕集編年校注》繫於永壽二年（156）。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頁 212、883；鄧安生，《蔡邕集編年校注》，頁 290、607。

39 按：如繫於建寧元年（168）的〈冀州從事張表碑〉，四年（171）的蔡邕〈郭有道林宗碑〉，建寧後〈大尉楊震碑〉；熹平二年（173）〈廣漢屬國侯李翊碑〉，四年（175）馮光疏文；光和元年（178）的蔡邕〈敘樂〉，六年（183）的〈漢成陽令唐扶頌〉；中平二年（185）〈郃陽令曹全碑〉、〈太尉劉寬碑〉，以及四年（187）的〈小黃門譙敏碑〉等。見洪适，《隸釋・隸續》，卷 8，頁 91、卷 12，頁 136、卷 9，頁 102、卷 5，頁 60、卷 11，頁 124、卷 11，頁 126；鄧安生，《蔡邕集編年校注》，頁 142、598-599、290、607；司馬彪，《續漢書・律曆志》，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志第 2，頁 3037；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卷 1，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石刻史料新編》第 1 輯第 1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讖」，亦甚是突兀。誠如廖平所言：「使當時果有六緯，與經並重，何以時人並不一及，惟李尋一語？東漢尊信讖記，無所不至，使緯名與經對文，何不以緯名讖？蓋緯名之貴，乃東漢末師私尊其學，俾與經對，西漢並無此說也。」[40]

概言之，李尋「五經六緯」之「緯」的內涵縱使與儒學相關，仍不宜就此直接與讖緯相繫，甚或與「經讖」等同。

（二）成帝時張霸所獻偽《尚書》「百兩篇」說之見載「經讖」

《漢書・儒林傳》載成帝時張霸（?-?）嘗獻偽古文《尚書》「百兩篇」：

>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採《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欽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41]

偏巧「經讖」中〈春秋說題辭〉、〈尚書璿璣鈐〉所載錄的《尚書》篇數，與經學史上其因今古文、真偽、散佚等情況而曾有過的多種說法都不相合，而均獨同於張霸所獻版本——

> 《書》之言，信而明，天地之情，帝王之功，凡百二篇，次弟委曲。（〈春秋說題辭〉）[42]
>
> 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尚書璿璣鈐〉）[43]

劉明便據此認為：「獻偽書此事發生在成帝之時，且在獻書之後即被發現，說明《百兩篇》的流布應只為成帝之時，而此種說法又恰恰被納入〈春秋說題辭〉中去，則說明〈春秋說題辭〉的造作應為成帝之時，從而側面反映出《春秋緯》

公司，1982），頁 9207。

40 廖平，《經話》（成都：巴蜀書社，2019），乙編，頁 109-110。

41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儒林傳〉，《漢書》，卷 88，頁 3607。

42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下）》，頁 19424。

43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上）》，頁 189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成書時間應亦為成帝之時。」[44]這番分析於今人看來無疑極為在理，但倘結合王充（27-約 97）所敘述的《百兩篇》後續傳播及東漢前期世人對《尚書》篇目的認知情況來看，上述論斷恐未能成立。《論衡・正說》云：

>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45]

按照《論衡》撰著體例，王充既載此事特予「正說」，可知至少在東漢前期，此說仍是有相當聲勢的。且這段文字也說明了成帝雖「黜其書」但「惜其文而不滅」，至少王充時《百兩篇》版本仍是「傳在世間」的，並成為俗儒採取之一說。據此，讖緯文獻中對《尚書》「百兩篇」說的載錄，僅能證明〈春秋說題辭〉、〈尚書璿璣鈐〉這兩部「經讖」的造作不應早於張霸獻書，而不能斷定其成書時為成帝時期。

此外自也不排除「張霸之偽百兩篇，是依附緯說而來」的可能性，皮錫瑞即認為「張霸造百兩篇，必因緯書本有百二篇之說，故分析篇數以當之。……然則從古並無此說，霸何敢憑空撰造乎」，張西堂亦謂「張霸之偽百兩，在當時即已發覺，造緯說者，又何必依此偽說」。[46]但此說有五方面值得商榷：

首先，就篇數而言，即便張霸偽作在前，其「百兩篇」亦未可目為「憑空撰造」。劉向（77 B.C.-6 B.C.）便曾有「孔子所論百篇」之語，[47]前引《漢書》稱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

44 劉明，《漢代《春秋緯》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王長華先生指導，2010），頁 48-49。

45 漢・王充，《論衡・正說》，黃暉，《論衡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1938），卷 28，頁 1119-1121。

46 清・皮錫瑞，《書論》，《六藝論疏證》，吳仰湘編，《皮錫瑞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第 3 冊，頁 544。張西堂，《尚書引論》（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58），頁 68-69。

47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藝文志〉，《漢書》，卷 30，頁 17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百二篇」，《論衡》更稱其「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48]「分析」意味著他確實有意對應一定數目，《書序》、「百篇之序」則說明其所比附的應是時已流行的百篇《書序》——實際上「百二篇」倘扣除所謂的「首尾」也正是「百篇」。退一步說，即便仍舊「百二」而言，從時人對《詩經》的篇稱來看，「三百篇」與「三百五篇」是互辭的，兩種說法都很常見，甚至共存在一段文字裡。[49]因此「百兩篇」固然並非「憑空撰造」，但也並不就得源自讖緯之說。

其次，〈尚書璿璣鈐〉的相關說法——「（孔子）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此處提及的十八篇《中候》，顯然是據其已流傳於世的情況而發辭，那麼所稱百二篇《尚書》情理上也應如是，即已有張霸偽作在先。

其三，張霸詐偽被否定的是文本而非篇數，前引王充「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就能看出這點——誠然時儒並不以張霸版《尚書》為真，但篇數方面是有相當接受度的。於是在存世的今古文《尚書》看似存在缺篇，百篇《書序》又無相應正文的情況下，「造緯說者」界定《尚書》原始篇數時採用「傳在世間」得見全本的「百兩篇」數量，是相當正常的，不存在「何必依此偽說」的問題。

其四，成書在《尚書緯》前的《尚書中候》就已存在與張霸一脈相承的「在《尚書》中融入《左傳》思想」，而這「應該受到張霸的影響。考慮張霸上書事敗，平當等人曾勸說成帝保存『百兩篇』，由此可以推斷《尚書緯》最有可能出於平當後學之手」。[50]

此外，《尚書緯》中的帝德譜系，在張霸詐造「百兩篇」時期仍未佔據主導地位，當出於張霸之後更晚的年代。

據此，就先後關係而言，相比「張霸之偽百兩篇，是依附緯說而來」的可能性，恐怕還是孔穎達（574-648）「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51]的說法更為合理一些。而由於此一版本至東漢仍「傳在世間」影響俗儒，且被

48 漢・王充，《論衡・正說》，黃暉，《論衡校釋》，卷 28，頁 1121。

49 漢・王充，《論衡・正說》：「《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複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黃暉，《論衡校釋》，卷 28，頁 1125。

50 任蜜林，《漢代「秘經」緯書思想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頁 204。

51 漢・孔安國傳（舊題），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 1，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否定的也並非篇數，則與其說頗有關係的〈春秋說題辭〉、〈尚書璿璣鈐〉，其造作年代下限遠不止於成帝之時。

（三）成帝時楊春卿先祖所傳「秘記」

《後漢書》載曾任公孫述（?-36）將領的楊春卿（?-?）「善圖讖學」，對兒子楊統（?-?）留下「吾綈帙中有先祖所傳秘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的親口遺命，於是楊統「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其不僅能「推陰陽消伏」，更因成功求雨而「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著有《內讖》二卷。統子楊厚（72-153）亦因「曉讀圖書」受召「問以圖讖」，逢災異「輒上消救之法」。[52]據此，李梅訓由春卿之「善圖讖學」推論其先祖所傳的「秘記」實即「讖緯書」，認為其與圖讖「只是名稱的不同而已，所指代的書籍是同一的」，並以「父子相間的年齡差以平均15歲遞減」為假設推算傳下「秘記」之春卿先祖弱冠向人「學習圖讖」的年限，指出「比較成規模的讖緯書的形成時間至少不晚於漢成帝時期」。[53]

關鍵在，上述推論所仰賴的關鍵前提——「秘記實即讖緯書」是否真能成立，是有極大商榷餘地的。「秘記」一稱出自楊春卿本人口白，可目為當其時的語料而非後世史家成辭。就西漢晚期而言，名為「秘記」者，《七略》太史令尹咸所校〈數術略〉[54]「天文」類下即著錄有《圖書秘記》十七篇，然而張衡〈請禁絕圖讖疏〉抨擊光武官定之《圖讖》時卻堅稱「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55]可知此所謂「秘記」斷無法與所謂「讖緯書」劃等號，而係另有所指，是極其分明的。畢竟作為〈藝文志〉前身的劉歆（約50 B.C.-23）〈七略〉對各部書籍的著者、內容、師承、真偽和存佚等情況原有詳細表述，而劉向〈別錄〉於此則又更詳，從今存佚文的涵蓋面來看，很可能觸及《圖書秘記》具體篇目。然而張衡既云「無讖錄」，則知至少在《別錄》、《七略》對《圖書秘記》的敘述中，必未展示出與官定《圖讖》諸篇有所關聯的信息。

至於此《圖書秘記》究竟是何種性質的內容？不妨細辨〈藝文志〉所體現

52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楊厚傳〉，《後漢書》，卷 30，頁 1047-1049。

53 李梅訓，〈讖緯文獻初步形成于漢成帝時期考〉，《齊魯學刊》2013 年第 1 期，頁 50-51。

54 按：〈藝文志〉原據〈七略〉增減而成，劉歆總群書奏其〈七略〉，但數術之書係太史令尹咸所校。「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藝文志〉，《漢書》，卷 30，頁 1701。

55 漢・張衡，〈請禁絕圖讖疏〉，張震澤，《張衡詩文集校注》，頁 3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處理原則。〈數術略〉「因舊書以序數術為六種」——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並就《圖書秘記》所隸屬的「天文」類如是序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殆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56]「天文」簡言之即「星事」，且從同類著錄可知這還是個囊括了雲雨虹霓霜雪霰雹等大自然現象的廣義範疇，意義在供「聖王」「參政」。這從近的來說便是當時天人感應災異體系所熱衷的內容，溯源則為《易・繫辭》的仰觀俯察傳統：「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57]實際上〈繫辭〉此言便是「河圖」、「洛書」與「天文」始終被緊密關聯起來的最初緣由，而劉歆對此的闡說則是：「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58]那麼劉歆所呈〈七略〉中隸屬「天文」類的《圖書秘記》就仍然是傳統上天贊政一脈的河洛星事之流，而還不是渲染五德籙命授受的《圖讖》。

值得一提的是，從存世語料的歷時語用來看，在〈七略〉完成後沒多久，「天文」一詞的傳統內涵，便隨著王莽居攝宣揚「符命」而有所變化、擴充。就〈繫辭〉「仰以觀于天文」所體現的，「天文」原指的是星事——當時「天垂象」的「象」之主體，直至漢、新之交符命概念熾盛，如居攝三年莽奏稱的「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承天命，用神令』」[59]（翌年所班《符命》題名即取意於此），所謂「符命」是被矯稱、理解為天命文字的，並隨著影響日增而成為「天文」的一種，遂有《華陽國志》張滿「為天文所誤」之歎，[60]《後漢紀》中建武五年時人將〈赤伏符〉載錄光武天命一事描述為「上之姓號，具見於天文」。[61]但這些能夠指稱讖錄的所謂「天文」，已都是後話，其與〈數術略〉序中界定的「天文」早已有所不同，不能用於反向說明《圖書秘記》的性質。

56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註，〈藝文志〉，《漢書》，卷 30，頁 1765。

57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 7，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頁 82。

58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註，〈五行志〉，《漢書》，卷 27，頁 1315。

59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註，〈王莽傳〉，《漢書》，卷 99，頁 4093-4094。

60 晉・常璩，〈公孫述劉二牧志〉，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 5，頁 331。

61 晉・袁宏，〈光武帝紀〉，《後漢紀》，卷 5，漢・荀悅、晉・袁宏著，張烈點校，《兩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下冊，頁 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數術略〉編著者在轄下「天文」類所著錄的書目，內容性質上理該契合其於該類序言中對「天文」作出的定義。亦即，與「河圖」、「洛書」相關的這部「秘記」，就分類而言更可能是圍繞著「星事」吉凶相關作品——正與同類其他著錄一脈相通，而這也更契合楊統獲得先祖「秘記」後「學習先法」、「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推陰陽消伏」、「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等的經歷。楊氏祖傳之「秘記」當與隸屬「天文」類的《圖書秘記》相類，乃是同一時世語境下以「星事」為核心者，與後來光武官定《圖讖》中那一系列的、致力渲染古史帝王臨觀河洛以受龍圖龜書且合乎錄讖，從而證見五德符命體系的《河》、《洛》諸篇，在內容主題上是迥異的，不宜混為一談。至於攀附孔聖經說的諸「經讖」，與之就更看不到丁點關係了。

四、漢新史料、後世語料三則
——未可用以證「經讖」系列行於西漢、新莽

上述三則之外，另兩則常用於證「經讖」行於西漢的西漢史料，乃《華陽國志》所載成帝時「漢史案圖緯」求得王延世說，以及東漢張衡請禁絕疏中的「《圖讖》成於哀平之際」說。此二者雖同言西漢晚期之事，但就語料層面而言，皆為後人追述之辭與相應理解。且前者屬於疑似後人偽竄，後者源於學術推論，都頗有商榷之處。

此外還有一則亦屬後世語料，但卻成為歷來判斷「經讖」行世時段最被倚重的關鍵證據——曾被《後漢書》鑿鑿載錄的「惲據經讖」一事。正是這條新莽時期的史料，促成學界以《圖讖》中「經讖」著述的形成年代下限當以此往上推的共識。但考郅惲（?-?）本傳，「經讖」一詞非出其人之口而係史家追述時的指稱之辭。既為後世語料，則意味著在借重之際亦須充分留意，范曄的認知、理解下所書寫與展現出來的事況，會否受時世變遷與觀念嬗遞的左右，而與當初實情有所差距。職是之故，比較不同史籍對同一事的記載，將能更直觀地釐清其中的偏差情況。

以下分別論之，以見其未可用以證《圖讖》中的「經讖」系列行於西漢、新莽。

（一）成帝建始五年（28 B.C.）「漢史案圖緯」求得王延世說

《華陽國志》卷十〈犍為士女〉「王延河平，纂禹之功」常璩（?-?）注云：

> 王延世，字長叔，資中人也。建始五年，河決東郡，氾濫兗豫四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三十二縣，沒官民屋舍四萬所。……漢史案『圖緯』，當有能循禹之功者，在犍、柯之資陽求之，正得延世。徵拜河堤謁者，治河。[62]

李梅訓因而認為：「在此時史官就能憑『圖緯』按書索人，……可見早在漢成帝初年時讖緯文獻就有『書』可據了。……比較成規模的讖緯書的形成時間至少不晚於漢成帝初年。」[63]這個推論固然言之成理，但其所仰賴的前提卻存在極大問題。王延世（?-?）治河事見於《漢書》之〈成帝紀〉與〈溝洫志〉，而正如任乃強指出的，「勘對常氏此註全用班氏文者四十餘字，則其取材《班史》可知，然有歧互者數點，究孰為誤，茲當辨訂」，其中「漢史案圖緯」一節當為後人所竄入，他辨析道：

> （該節）不見《漢書》。《漢紀》、《通鑒》均不著錄。由舊刻註文有「資陽」二字，可疑此節係隋唐人妄為竄入。《兩漢》、《晉》、《宋》、《齊》等史書的《地理（郡縣）志》皆只有資中縣，無資陽。今資陽縣，即漢魏六朝之資中縣治。後周始改名資陽，為資州資陽郡治，並分資中為磐石縣，屬焉。隋徙資州治磐石，資陽縣屬之。王延世本資中縣人，家所在，為周、隋以來之資陽縣，此非常璩所及知，則此注文中，安得為「犍柯之資陽求之」句？且犍、柯，當指犍為、牂柯兩郡。即使「資陽」為「資中」鈔訛，其地實在犍為之東北，與蜀、廣漢近，去牂柯絕遠。曰「犍、柯之資陽」，實不成文。疑是迷信圖緯者造此說，竄亂於常氏文中。因其用「資陽」字，故可疑為隋唐人所為也。[64]

就歷時語境而言，儘管是地點相合，但「資陽」乃周隋始用的易名，不應為東晉常璩所知。加之「《常志》於前漢人物悉依《漢書》，惟此註頗有異同」的特殊現象，亦為「係隋唐人妄為竄入」的可能性增強了說服力。[65]據此，「漢史案圖緯」一節，恐不合適用於推論所謂「讖緯書」的形成時間。

62 晉・常璩，〈犍為士女〉，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 10 中，頁 582。
63 李梅訓，〈讖緯文獻初步形成於漢成帝時期考〉，頁 51。
64 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 10 中，頁 586。
65 同上註，卷 10 中，頁 5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張衡「《圖讖》成於哀平之際（7 B.C.-6）」說

東漢張衡對《圖讖》成書的探討，實則與今人同樣是以後人視角就所見讖緯文獻之內容而作的學術推論，面臨的困境是近似的，所提供的也並非《圖讖》形成之際的人事見聞。但作為近乎最早研析此問題者，其說不可輕忽；而作為得見《圖讖》全豹者，〈請禁絕圖讖疏〉確也載有一些現已無法親睹的信息，不得不關注。

張衡所提出的「《圖讖》成於哀、平之際」說，乃是建立在其疏中所指出的三項緣由之上的，其中「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用於判斷《圖讖》不早於此時，「至於圖中訖於成帝」則用於明確《圖讖》成於成帝在位結束之後，「王莽簒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用於判斷《圖讖》不晚於新莽，從而得出「哀、平之際」的結論。向歆父子目錄學之作中未有《圖讖》相關內容，《漢書・藝文志》「天文」類著錄之《圖書秘記》與所謂的「讖緯書」亦無甚關聯，說已見前，茲不贅複，此一時間上限基本可以成立。然而後二項緣由在論斷及理解上卻存在較大問題。

首先，我們固可因《圖讖》載有成帝世數之類的特定時代性內容而判斷其問世必晚於成帝，卻不能因其未載有王莽（45 B.C.-23）簒位之類的特定時代性內容而斷定其成書必早於新莽（9-23），這畢竟得取決於「讖緯書」造作時的背景及意圖，不應排除略而不述的可能性。例如，倘使《圖讖》成於新莽治下，所謂「漢世大禍」的簒位之「戒」自然就難見蹤跡。再如張純〈泰山刻石文〉[66]從《圖讖》各篇所摘引的六條讖語，其與光武登極封禪（56）諸事的絲絲入扣，足證此六篇當是建武時期定稿的無疑，但篇中顯然也未載有能令張衡發現的新莽簒漢相關信息，可見造作意圖確實會左右內容取捨，當時的光武君臣想必更關注、重視為所面臨的政治困境造勢，而非已不成威脅的舊事。因此，推論《圖讖》的成型不早於何時尚且可行，但年代下限就極其困難了。

其次，「圖中訖於成帝」而不及哀帝（7 B.C.-1 B.C.在位）、平帝（1 B.C.-6 在位），只能說明特定的相關篇章成於「哀、平之際」，而不能理解為《圖讖》八十一篇都成於是時，畢竟諸篇互斥之處所在多有，它們原是來頭各異的獨立著述，雖被光武強行統合為「一卷之書」的模式，終不能以偏概全，尤其行世當時便明確有所劃分的《河》、《洛》與「經讖」兩支，在源流發展上更不宜混為一談。實際上張衡在疏中交待諸事內容出處時對《圖讖》文獻的指稱方式是很值得辨析的，其涉及者有四：「《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

66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祭祀志〉，《後漢書》，卷 97，頁 3165-31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至於圖中訖於成帝」。疏中能清晰張衡是有統稱、分稱的意識的：稱《春秋讖》時是表明適用於隸屬《春秋》的所有「經讖」——這是很可能的，因為「共工理水」說是從《左傳》「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67]而來的整個《春秋》學界立場；稱〈春秋元命包〉時則是專指單篇——這也挺合理，因為公輸班（約507 B.C.- 約444 B.C）與墨翟（約468 B.C.- 約376 B.C）之事顯然不是通用體系層面的。而與「凡讖」相對立的《詩讖》也明顯是在強調經藝流別問題，所指出的「蚩尤敗然後堯受命」也明顯是整個《詩》學界所必需站立場的。張衡拈出「詩讖」一詞來概括《詩讖》系列諸篇，拈出「春秋讖」一詞來概括《春秋讖》系列諸篇，則其「圖中訖於成帝」之「圖」恐極可能是《河圖》諸篇之統稱。一來，在圖讖領域中，《河圖》系列原正是以「錄圖」形式立足的，被認為是載有「帝王錄紀，興亡之數」[68]的圖典，即〈雒書靈准聽〉所謂「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69]二則，張衡既是在力請禁絕整套《圖讖》八十一篇，則在其主動將之涇渭分明地劃作為「河洛五九，六藝四九」[70]兩大類下，便不太可能會只一味抨擊「六藝」之屬而徹底迴避「河洛」之流，其奏疏全文也唯有此處可產生聯繫。這意味著在張衡的認知裡，《圖讖》中「成於哀、平之際」者，至少包含了相當數量的《河圖》，甚至主要就是《河圖》諸篇，這是〈請禁絕圖讖疏〉所提供的較有價值的信息。故「圖中訖於成帝」的成於「哀、平」之相關篇章，並不必然囊括「經讖」。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張衡以「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判斷《圖讖》不早於此時，固然言之成理，然而考慮到向、歆在甘忠可（?-約22 B.C.）、夏賀良（?-約5 B.C.）之事上的表現，看似也不能排除是他們主動「不錄讖」的可能性，茲平議一二。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宣稱「漢家曆運中衰」並以「赤精子之讖」倡言漢「當更受命於天」，[71]

67 詳《左》昭十七年。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卷 48，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頁 2083。

68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尚書中候》，《緯書集成》上冊，頁 401。

69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下冊，頁 1261。

70 《後漢書・張衡傳》李賢注引《衡集》上事。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 59，頁 1913。

71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李尋傳〉，《漢書》，卷 75，頁 31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漢該改行火德制了」，[72]而從《漢書・李尋傳》的相關記述可清晰看到向、歆父子抨擊的要素：甘忠可被劾「假鬼神罔上惑眾」、「不合五經」，其繼任者夏賀良據詔令則是「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即問題關鍵其實在這三點——假鬼神、違聖、背經。[73]「赤精子之讖」中以相生為義的「漢室火德」說，在彼時是具備相當認同度的——鹽鐵會議時「相生說」就已蔚成聲勢，[74]會後更「成為五行說的主流」，[75]它其實比據相勝為說的漢家土德觀在學理上越來越獲儒林擁戴，而從《漢書・律曆志》所載錄的、後來由劉歆總領下完成的〈世經〉可知，他也是赤漢說的擁護者，但這不代表就能認可「假鬼神」的、無聖人印記的作品被採用。就如徐興無所言，「儘管來自民間的自禪受命的思想也主張五德相生的次序，但由於假借鬼神，不合儒家的經典，缺乏經學的依據，加之易亂朝政，因而被他們視為邪門左道。因此，劉歆在此時毫不猶豫地與他的父親，甚至與他在學術上不合的丞相、大臣們站到了一起」，[76]此事體現的恐更多是孔聖經術與鬼神雜說之爭，而非關如何看待圖讖。倘換成是以矯托孔聖、攀附經學的《圖讖》來證說，向、歆的立場又將是如何？此雖不得而知，但他們原先否定甘、夏所抨擊的假鬼神、違聖、背經三要素，顯然都已派不上場。綜上，應確實是「無讖錄」而非因「安肯通此道」而「不錄讖」。

就西漢晚期而言，誠然當時以相生為義的五德更代論已有一定聲勢，其錄運譜系甚或也已流傳，但設使當時——截至哀帝建平二年（5 B.C.），已有與之同構的、矯託孔聖的、渲染炎漢赤劉的「經讖」諸作成篇行世，甘、夏之徒何至於未加倚仗而只得自行「詐造」後落得「假鬼神」、「違聖」、「反道」的慘淡收場？反倒是官方所頒定的這些個罪名，適足以令有心人深獲啟迪，明白攀附孔聖、迎合經誼的重要性，從而推動此類作品的出現——後來〈世經〉不就是在博引「五經」及「律曆」領域要典的基礎上將歷代帝王聖者嵌入五德相生框架來立說麼？又，稍後一些，隨著王莽柄政的元始四年（4）就「圖讖」

72 楊權，《新五德理論與兩漢政治：「堯後火德」說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81。

73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李尋傳〉，《漢書》，卷 75，頁 3192、3193。

74 說詳王愛和，〈五行之相克相生與秦漢帝國的形成〉，艾蘭（Sarah Allan）、汪濤、范毓周主編，《中國古代思維模式與陰陽五行說探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 395-397；崔瑞德（Denis Twitchett）、魯惟一（Michael Loewe）編，胡志宏譯，《劍橋中國秦漢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201。

75 徐興無，《讖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構建》，頁 173。

76 徐興無，《劉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3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個學術門類徵召「通知其意」者「記說廷中」以便「正乖謬，壹異說」[77]，不久後的居攝二年（7）其〈大誥〉已能向天下臣民自詡「《河圖》、《洛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墜，古讖著言，肆今享實。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78]可知《河》、《洛》系列經由王莽的推動而在當時頗具聲勢方得如此借重，但與此同時，一心攀附六藝的「經讖」也必然尚未活躍起來，否則何以正深陷輿論的王莽通篇洋洋灑灑致力為自身辯護時，不將孔氏經讖一併綁架？以至最終孔聖意志成了與之敵對、心懷漢室者的有力旗幟。[79]

（三）新莽地皇元年（20）郅惲的「據經讖」及「孔為赤制」說

基本上，《後漢書》中郅惲「據經讖」一說，其實只要對照此事上其所依本、取材之《東觀漢記》的記載，即知很難以之為重要依據——

《東觀漢記》	《後漢書》
郅惲……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即收系惲。難即害之，使黃門脅導惲，令為狂疾惚恍，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80]	郅惲……乃上書王莽，……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忽，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81]

范曄對史料加以潤飾的撰著風格於此已可見端倪。他將「所言皆天文」增補成「所言皆天文聖意」，並為王莽的「難即害之」補上緣由——「惲據經讖」，這一變動是基於郅惲上書中「（天地）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為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云云的內容。范曄囿於官定《圖讖》所展示的既定框架與認知，或自以為訂補得當，殊不知東漢學者並郅惲只述「天文」而不言「經讖」是因為這的的確確就是當時他們的

77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王莽傳〉，《漢書》，卷 99，頁 4144。

78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翟方進傳〉，《漢書》，卷 84，頁 3432。

79 按：有關王莽柄政時期圖讖領域之發展，詳見郭思韻，〈「天」與「聖」的角力：兩漢之際政權統緒主導下「圖讖」領域的發展與嬗變〉，《清華中文學報》第 27 期（2022 年 6 月），頁 133-148。

80 漢・劉珍等，〈郅惲傳〉，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14，頁 574。

81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郅惲傳〉，《後漢書》，卷 29，頁 10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意。所謂「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82]在上承此一傳統的「圖讖」領域，彼時被稱為「天文」的，是傳為「河龍圖發，洛龜書感」[83]所出的《河》、《洛》正文，被界定為上天垂示的符命之文，因稱，如《後漢紀》就記述了建武五年（29）時人將〈赤伏符〉（後列入《河圖》）載錄光武天命一事描述為「上之姓號，具見於天文」。[84]至於「聖人則之」而出的「經讖」系列，在新莽時期的世俗地位上是遜於《河》、《洛》的，這是「天文」高於「聖意」的問題，張純〈泰山刻石文〉「皇帝唯慎《河圖》、《洛書》正文」的態度，以及其文中雖兼稱「《河》、《洛》命后，『經讖』所傳」，但前者援列五篇而後者僅一出的做法，都很鮮明地體現了這個差距。[85]郅惲上書中的「（天地）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指向的便是天授《河》、《洛》，「漢歷久長，孔為赤制」則似乎不過是西漢後期所衍生的、公羊學派孔子作《春秋》為漢制法說的火德化，與後來公孫述「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86]的思路基礎相類（儘管後續推論結果相悖），即「作《春秋》」本身就是孔子為漢的「赤制」。則范曄將「所言皆天文」增補成「所言皆天文聖意」倒還勉強可通，但總括以「惲據經讖」就不免畫蛇添足，悖離實情了。

概言之，從這則史事可看到的情狀是，「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意味著以圖錄世表為核心的《河圖》系列果如前文所言已聲勢極盛，而一心攀附六藝的「經讖」雖仍未活躍，但「漢歷久長，孔為赤制」的緊銜並列則表明孔子的角色此時已被「圖讖界」錨定了。

五、建武史料兼語料三組與後世承變問題——展現「經讖」系列成規模地出於建武

建武時期，有三組史料尤其值得關注，分別為：蘇竟（?-?）〈與劉龔書〉中的「孔丘秘經，為漢赤制」言辭，公孫述（?-36）檄之稱引〈錄運法〉、〈括地象〉、〈援神契〉篇名與光武帝回書稱引的「西狩獲麟讖」，以及桓譚（?-?）

82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卷 7，清・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頁 82。

83 鄭傑文等整理，〈春秋說題辭〉，《兩漢讖緯文獻（下）》，頁 19429。

84 晉・袁宏，〈光武帝紀〉，《後漢紀》，卷 5，漢・荀悅、晉・袁宏著，張烈點校，《兩漢紀》下冊，頁 78。

85 晉・司馬彪，《續漢書・祭祀志》，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志第 7，頁 3166。

86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公孫述傳〉，《後漢書》，卷 13，頁 5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否定「孔子並為讖記」到極言「讖之非經」的態度遞衍。表面上看，此三組似皆兼為當其時的語料，是能最大程度如實展現彼時情狀的重要文獻證據；可實質上，其中尤為關鍵且最具影響力的公孫述檄一條，細校史錄可知，諸名目實為史家補述，只能劃歸後世語料，結合其他記載審慎辨析。以下分別論之，以階段性地證見《圖讖》中的「經讖」系列的規模成形當在建武。

（一）建武三年（27）蘇竟〈與劉龔書〉「孔丘秘經，為漢赤制」說

《後漢書》本傳載蘇竟〈與劉龔書〉云：「夫孔丘秘經，為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效歟？」[87]此中看似指向「經讖」的「秘經」，實則頗有值得商榷之處。要探明這點，首先必須辨識《圖讖》諸篇的各層次類別。

前云彼時能被稱為「天文」的只有《河》、《洛》，而《河》、《洛》於文本上其實又有所謂「正文」（或稱「本文」）與「演文」之分，即《隋志》引說者的「《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88]〈春秋說題辭〉等存世佚文，[89]以及上文光武「唯慎《河圖》、《洛書》」時對「正文」的強調，都足證這確實就是當時的情況。十五篇「正文」被界定為上天授予帝王聖者的符命，〈河圖赤伏符〉即此類之屬；卅篇「演文」則號稱匯總了孔子等「九聖」對「正文」進一步的闡說與佐證。而根據〈易緯是類謀〉勾勒的「圖讖傳承史」，九聖的增演在內容上是各司其職的，孔子所承擔的責任為——

> 集紀攸錄，括要題訖備，命者孔丘。玉演斗佮之世，卯金刀用治，謨修六史，宗術孔書。皇政毀道，散命名胡。秘之隱在文，未消於亂。藏設《世表》，待人味思。帝必有察，握神嬉，世主永味，神以知來。命機之運，由孔出，天心表際，悉如河洛命紀，通終命苞。乙錄摘亡，……[90]

在圖讖界的認知裡，孔子受命集紀古錄，據以增演，其依本對象實際就是《河》、

87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蘇竟傳〉，《後漢書》，卷 30，頁 1041-1046。

88 唐・魏徵等，〈經籍志〉，《隋書》，志第 27，頁 941。

89 〈春秋說題辭〉：「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王者沈禮焉。」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下）》，頁 19429。

90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上）》，頁189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洛》「正文」，故說他「表際」了「天心」，又稱其成果「悉如」天授的「河洛命紀」，比方〈洛書摘亡辟〉顧名思義很可能便是傳為孔子「乙錄摘亡」等任務的產物之一，《易緯》所稱「孔子表〈洛書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其先星感，河出圖，挺白以胡誰亡」，[91]便相當直觀展現了託為孔子的增演方式。此外，「命紀」、「乙錄」、「世表」都透露了文中孔子所「藏設」的是比較純粹地「帝紀世讖」式內容，鄭玄亦謂之「帝王之圖錄」；而所「秘隱」的，即便如鄭玄注將之擴大範圍為「洛之書及五經」，也仍沒看到這之中納入「以經合讖」或「以讖合經」的「經讖」著述。

蘇竟「秘經」所指者何，在其〈與劉龔書〉強調的「赤漢」目標上，孔子遵循「河洛命紀」所增演出的、成功「表際」了「天心」但曾被「秘隱」、「藏設」的「乙錄」、「世表」，比起闡經意圖及緯學性質較濃的「經讖」，無疑具有更強的針對性與說服力。尤其孔子此舉，是個遠比讖緯興盛期要早很多就出現的傳言——漢初陸賈（240 B.C.-170 B.C.）即稱孔子曾「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按紀圖錄，以知性命」，[92]可知至遲在秦漢之交，即流傳有孔子「援引古圖，……陳敘圖錄」[93]一類的說法以及號稱由孔子集紀、增演並載有「世讖」的「帝王之圖錄」。因此就「圖讖」領域的發展而言，《河》、《洛》存在「正文」、「演文」以及與孔子產生交集，是至遲漢初就已發生的說法，當然彼時尚無多少影響。直到成、哀時的甘、夏事件後，才真正大層面引發了漢人對時聖孔子名義的矯用，期能在經誼聖制的審判中全身立足，於是孔氏讖記自此迭出。[94]蘇竟所謂「孔丘秘經」，很可能是指孔子「秘隱」、「藏設」的，既有天授「正文」也有孔子「演文」的《河》、《洛》「世表」，而未必便是後來經、讖合流成的「經讖」之屬。這一點不妨參看下文桓譚於翌年所上之〈抑讖重賞疏〉以及後二年光武帝回書之「西狩獲麟讖」，對此「秘經」具體所指，當體現得更為真切。

91 鄭傑文等整理，〈易緯通卦驗〉，《兩漢讖緯文獻（上）》，頁 18885。

92 漢・陸賈，《新語・本行》，王利器，《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下，頁 142-143。

93 鄭傑文等整理，〈春秋演孔圖（補遺）〉，《兩漢讖緯文獻（上）》，頁 19197。

94 按：成、哀時甘忠可、夏賀良以天命運數論政諫言改制卻被劾「不合五經」、「背經誼，違聖制」、「反道惑眾」而被下獄病死乃至伏誅，而後來的郅惲背靠「天文聖意」以至於王莽分明「大怒」卻「難即害之」最終「會赦得出」，如此迥異的結果，令人深思。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卷 75，頁 3192-3193；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 29，頁 10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建武六年（30）公孫述檄稱引〈錄運法〉、〈括地象〉、〈援神契〉與光武回書之「西狩獲麟讖」

建武六年，公孫述與劉秀曾針對行世圖讖的內容進行了一番辯駁，而《後漢書》中的明確稱引篇目題名，對讖緯領域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誤導，很容易以為當時已有成篇的〈河圖錄運法〉、〈河圖括地象〉、〈孝經援神契〉等流傳於世，認為公孫述所引諸「讖言」即篇中內容。但若與《華陽國志》同一事的記載參校——未載上述諸篇名謂而但稱「西狩獲麟讖」，便能發現其中大有可疑。且看下表：

出處	東晉常璩《華陽國志》	劉宋范曄《後漢書》
史籍原文	（公孫述）乃移檄中國，稱引圖緯[95]以惑眾。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即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即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邪？……」[96]	（公孫述）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97]
讖篇名目	公孫述稱引的讖篇，光武回書謂之「西狩獲麟讖」。	公孫述稱引〈錄運法〉、〈括地象〉、〈援神契〉三篇。
讖語內容	公孫述稱引讖語內容不詳。	公孫述所利用的讖語內容，按主題歸組為： 一、「公孫」相關詮釋。 （《華》、《後》二史的光武回書均予正言。） 二、「卯金」相關詮釋。 （只有《華》中的光武回書予以正言。）

95 按：「圖緯」亦是後人用語，《後漢書》亦多見，實與「圖讖」同義，非當時已有緯類「經讖」。張峰屹稱應充分考量「漢代人在語言實踐中如何使用它們」，甚是。張峰屹，〈歷史維度的缺失——自唐迄今讖緯名義研究之述評〉，頁 93。

96 晉・常璩，〈公孫述劉二牧志〉，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 5，頁 331。

97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公孫述傳〉，《後漢書》，卷 13，頁 5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反駁內容	光武帝回書反駁，按主題歸組為： 一、「卯金」相關詮釋。 二、「公孫」相關詮釋。 三、「蒙孫」、「塗高」相關詮釋。	光武帝回書反駁，按主題歸組為： 一、「公孫」相關詮釋。 二、「塗高」相關詮釋。

愚以為單就建武六年公孫述檄文與劉秀回書之事跡中關乎讖記的載錄方面，《華陽國志》的記述要比《後漢書》來得更貼近原貌，有內外諸證：

首先，行文記述而言，《華陽國志》採用的幾乎純然是載錄原文的模式，基本可視作當其時的語料；《後漢書》則是一種綜述式的夾敘夾錄，較受史家成見、成辭左右。

其次，就雙方對話的內容而言，照《後漢書》所載，公孫述妄說的讖記，主要是「公孫」與「卯金」二則，但光武回書駁斥的卻是「公孫」與「塗高」之事，尤其遺漏了為「卯金」（劉）這個當時廣傳的、劉漢最大依仗之讖語正言更是匪夷所思，可推知其間必然有所簡省、改動，才會出現這等矛盾。前後不相應，此是內證。《華陽國志》則可為外證，其所錄光武回書中駁斥的讖語有三項，後一項「蒙孫」、「塗高」同為兩部史書所載理應屬實故存而不論，另兩項「卯金」、「公孫」卻能完整對應、反擊《後漢書》中公孫述的曲說。就情理而言，光武是為駁斥公孫述的妄說讖記而發，則其應對理當是扣緊公孫述所言，從這點上，《華陽國志》所錄恐怕要更全面、原始。

其三，就讖記出處而言，誠如黃復山所曾指出的「光武帝回復書函後之二十餘年間，史書載事，幾稱引圖讖者，概曰『讖』、『圖讖』或『圖書』，未再見任何篇名。迄光武帝宣佈圖讖（西元56）前後兩年，始於詔令、奏章中驟見〈河圖合古篇〉、〈雒書甄耀度〉、〈孝經鉤命決〉、〈樂動聲儀〉等八則讖書篇名」，私以為其所關注的「《後漢書》此段三條孤見特起之讖文篇名」確有其可疑之處，所推斷的「當屬范曄於述行文時，據劉宋傳流之讖緯篇名副之者，並非公孫述之時已流傳此類讖書篇目矣」亦是合理。[98]倘與《華陽國志》參校，有關讖記出處則被劃歸「西狩獲麟讖」，而無〈錄運法〉、〈括地象〉、〈援神契〉三篇之名。從客觀邏輯上，由於光武官定《圖讖》在前，後人有將諸篇統稱作「圖讖」的理由，甚至就讖語內容據時仍流傳的「篇名副之者」將之係於含有雷同讖語的三篇，卻斷無舍官定版本不顧而憑空另擬不見經傳的「西狩獲麟讖」一名的道理，除非光武的原文便持如此說辭。從這點上，「西狩獲麟讖」應比〈錄運法〉、〈括地象〉、〈援神契〉更可能是原始情狀。

98 黃復山，《漢代《尚書》讖緯學述》，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4編第11冊，頁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四，《後漢書》對前人史著的採摘刪補，從李賢（654-684）注中已可見一斑，論者亦不在少數，甚至有學者指出「對原有材料多加潤色，改動原文」的做法「被認為大致起於范曄的《後漢書》」。[99]「於述行文時，據劉宋傳流之讖緯篇名副之者」，與范曄《後漢書》全書的寫作原則與風格是一脈相承的，具有相當可能性。例如李賢注云：「《前書》（《漢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為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100] 便很能體現范曄的援引刪改、加工潤飾。《華陽國志》乃是一部嚴謹且深受歷代史家高度評價的史書，其成書在《後漢書》之前，本身也被《後漢書》多所取材，在某些部分比《後漢書》更貼近原始面貌，並非不可能的事。且這也非關史家水平問題，在范曄的視角，他其實只是在為來歷不明的讖語依據存世《圖讖》文獻考訂了出處，將未聞傳世、不知確否的〈西狩獲麟讖〉，訂補為當前能明確見到相關讖語內容的〈錄運法〉、〈括地象〉、〈援神契〉三篇。范曄這種精進嚴謹的寫史做法，多數時候能帶來史料層面的更大助益，但在特定課題的探微上——尤其與歷時語境相關如本課題者，偶爾確會造就差之毫釐的障礙，須與其他史籍史料語料多方參證其實。

概言之，《後漢書》所載的述引讖記之事，恐非公孫述的「移書中國」的原文，而是范曄的轉述、敘述之辭，是他作為後人，根據尚存的光武回書來擬構很可能其時已佚的公孫述書之內容，進而就他當前可見的《圖讖》篇作交待公孫述所稱引的讖記之條文與出處，並不代表這就是原始情況。由於「圖讖發展史」具有很強的歷時性特徵，後世史家以自身觀念行文、記述信息時便極易存在微妙偏差，前文訂補「聖意」是如此，此處增上讖緯篇名亦如是。亦即，具當時語料性質的「西狩獲麟讖」理應確是——或更準確說是比范曄的〈錄運法〉、〈括地象〉、〈援神契〉更可能是建武六年公孫述「移檄中國」所稱引的讖記原本名目。但因《後漢書》的史學地位，其明載聲名較著的有關篇目之舉，直接導致「西狩獲麟讖」落入無人問津的境地，然而這則史料兼語料，實則非常重要。

素被忽視的「西狩獲麟讖」，其定位及主題，顧名思義，是以孔子獲麟瑞而為聖王作法之事為題材、綱領所敷衍成的一種捍衛漢室正統與政權的文字，「乙子卯金」云云，蓋即傳聞中孔子遵循「河洛命紀」為劉漢題釗表命的讖語，即圖讖界所謂「玄邱制命帝卯金」[101]。就「西狩獲麟讖」的已知內容，「乙子

99 詳內藤湖南著，馬彪譯，《中國史學史》，頁 114-115。

100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南匈奴傳〉，《後漢書》，卷 89，頁 2939。

101 鄭傑文等整理，〈孝經援神契〉，《兩漢讖緯文獻（下）》，頁 195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卯金」是漢興之讖，「蒙孫」、「塗高」是漢亡之讖，「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則是漢世期間之事的預言，據此可知，「西狩獲麟讖」的主體內容大抵是涵蓋了漢祚盛衰要事的相關讖語之類，疑其即傳為孔子按紀增演的漢世錄運，是對孔子「秘隱」、「藏設」的《河》、《洛》「世表」中「漢錄」部分的讖語專稱。綜觀自郅惲、蘇竟以至公孫述、光武所據言、稱引的託孔之作，或重在強調孔為赤制的漢祚，或百般牽會引之為預決讖語，都明顯與經誼無甚關聯，反而郅惲所陳說的「（天地）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為赤制」及蘇竟所尚言之「本天參聖」的「孔丘秘經」，與「西狩獲麟讖」頗能契合。至於漢人當中見引有真正「經讖」的明確篇目與內容，[102]要到建武三十（54）至三十二年（56）間圍繞著泰山封禪之事的奏疏與刻文中，且封禪當年——中元元年（56）官定《圖讖》即正式發佈。[103]此前，都未見有其他任何的、後來理解中與經誼結合闡發之經讖諸作的存在。這廿餘年間，「西狩獲麟讖」是今存語料中唯一見載的、依託孔子的作品名目，而它是依附於《河》、《洛》作為「天文」流播的，並未觸及與重牽會經文義理的「經讖」。

（三）桓譚建武四年（28）對「孔子並為讖記」的否定到病逝前的「極言讖之非經」

實際上述所盛行的「圖讖」作品在建武年間，從早期重「世表」的《河》、《洛》，演變為後來類儒學的「經讖」，這個轉折在桓譚對光武帝的兩個時間節點的抗辯中是可以窺見的。

《後漢書》載桓譚於建武四年上〈抑讖重賞疏〉謂「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104]《後漢紀》則錄作「或收古之圖書，增益造飾，稱孔子並為讖記」。[105]觀桓譚此時之言，他對讖記的非議與不滿，焦點正在方士們的「矯稱」，在於讖記的假託孔子，使人主迷惑於讖記偽作而忽視了真正出自孔子的五經，故其言意在強調五經方為孔子之學的正義，而讖記的矯稱孔子不過是群小詐偽後的曲說，不足為信，不應聽納。至於內容上，「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者豈能動搖經藝，故此處讖記與五經的交集與積怨關鍵在作者問題。其云「收古之圖書，增益造飾」、「增益圖書」，而不稱「稽合圖讖」——後來以圖讖合經的那些「經讖」，也體現了桓譚著眼的

102 詳見張純〈奏宜封禪〉、〈泰山刻石文〉。

103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光武帝紀〉，《後漢書》，卷 1，頁 84。

104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桓譚傳〉，《後漢書》，卷 28，頁 960。

105 晉・袁宏，〈光武帝紀〉，《後漢紀》，卷 4，漢・荀悅、晉・袁宏著，張烈點校，《兩漢紀》下冊，頁 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未在他們對經書造成了什麼，而止於利用了古圖書做什麼，可知這時託名孔子的圖讖作品，的確是「河洛命紀」帝王「世表」之屬，將續補的新讖記矯稱為孔子所增演，這也即是上文所推測名為「西狩獲麟讖」的「漢錄」部分，並未涉及經學領域。

但後來，在桓譚病逝之前，「有詔會議靈臺所處，上謂桓譚曰：『天下事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106]的時候，桓譚的反彈就激烈多了，「讖之非經」的重點已遠不止於作者問題了，無論是指讖違背經抑或讖並非經，都說明其之於經已成附骨之疽。而當前他所拒讀的「讖」，顯然已再非「帝紀世讖」之流，而係兼涉經義頗深、內容上可資議決「靈臺所處」的「經讖」——「靈臺」之制見於存世《禮緯》。此事被《後漢書》繫於中元元年（56）。[107]按：學界對桓譚的卒年爭議甚多，儘管如此，凡對《後漢書》繫年持異議者，都仍肯定上述桓譚就靈臺一事與光武帝爭執並間接因此病逝的這則廣見於《東觀漢記》、《後漢紀》等的史料記載是屬實無疑的，只是對發生年限持見有別耳，故並不影響借此窺見桓譚的態度進展。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直至建武初期之時，經、讖都還沒有形成密不可分的交集，但建武後期抑或桓譚生命尾聲之際，兩者已然糾纏難解。那麼這個轉折究竟起於這期間的何時與何因呢？

六、建武早期光武陣營的需求及與《圖讖》相涉的關鍵舉措

稽考史料，自「赤精子讖」[108]以來，建武以前活躍於世的讖記，本質上都是圍繞政權而非關經義的「帝紀世讖」，新莽時的王況讖、李氏讖如此，至建武初年的王梁讖、孫咸讖亦如是，甚至明確與孔子扯上淵源的「西狩獲麟讖」也仍舊這般。至於何以從本不涉經義的讖記衍變為綜兼經說的「經讖」系列，則與光武陣營在圖讖領域所面臨的需求變化大有關係。

光武陣營既將明載劉秀姓名的〈赤伏符〉作為主君天命授受即位建元的憑據，則劉秀本人自然非常清楚「天文讖記」的可利用性與威力，對圖讖領域中

106 漢・劉珍等，〈桓譚傳〉，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卷 14，頁 548。
107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桓譚傳〉，《後漢書》，卷 28，頁 961。
108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哀帝紀〉，《漢書》，卷 11，頁 3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利己方的著述內容勢必不敢輕慢，故最先開展的便是詔校傳世圖讖的措施。《東觀漢記》載「尹敏為大司空掾，上以敏博通，令校圖讖」，[109]而尹敏（?-?）「辟大司空府」據《後漢書》乃建武二年之事，則此項工作當始於近期。尹敏執行任務時與光武帝之間的互動相當值得關注：

> 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110]

尹敏「增損圖書」之舉，恰可作為桓譚建武四年疏中所斥「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的註腳。尹敏受詔所校的對象，就作品而言，很明顯是其自陳的「圖書」——河洛之屬；從內容來看，本質是詭為隱語的預示性讖言。而就任務目標的角度，光武帝所期待驗收的是「蠲去」其中利於王莽的所謂不實內容來維護自身天命文字的確鑿，至於訂補讖書文本這一作為，其反應表明了現階段的他是嚴禁且反感的，因為這等同動搖其〈赤伏符〉天命依據的神聖可信。總體上，「校圖讖」這個詔令的最初使命，更多是面向已退出歷史舞臺的新莽妄說——有關「新室承漢」的元素，而這其實也可間接否定敵對陣營如公孫述之流自居金行以承新莽土德的五德更王譜系。至於明顯以炎漢赤劉之聖意為宣揚要領的「經讖」系列，在諸多劉姓天子起落爭勢的大背景下，這個目標恐怕很難成為當務之急。

直至劉姓天子們紛紛倒臺，最終餘下的光武陣營，遂迎來了新的境地與危機，在圖讖領域也有了新的需求。《東觀漢記》載：「六年二月，吳漢下朐城，天下悉定，唯獨公孫述、隗囂未平。……每幸郡國，……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間講經藝，發圖讖。」[111]而隗囂（?-33）、公孫述兩方，都極盡利用讖命元素攻擊光武天命的立足點。

隗囂嘗派人遊說竇融（16 B.C.-62），將「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宣揚為「一姓不再興之效」的現實驗證，而光武陣營則是靠「漢承堯運，歷數延長。

109 漢・劉珍等，〈尹敏傳〉，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卷 18，頁 831。
110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儒林傳・尹敏傳〉，《後漢書》，卷 79，頁 2558。
111 漢・劉珍等，〈世祖光武帝紀〉，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卷 1，頁 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後漢紀》謂「上之姓號，具見於天文」[112]）作為「它姓殆未能當也」、「漢有再受命之符」的論據才成功左右竇融。[113]還應一提的是，建武五年班彪（3-54）為勸說隗囂歸附漢室而撰寫的〈王命論〉，以「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為題旨，從「帝王世運」、「神器有命」強調漢劉的「堯後火德」與「赤帝之符」，[114]通篇「靈瑞符應」皆出自《史記》〈高祖本紀〉，全文未及孔子一辭，亦無廣載現存「經讖」著述的其他炎漢相關符瑞，與後來其子班固在〈典引〉中的三述「天命—孔佐—漢統」——「孔佐謂孔丘製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大陳漢之期運也」之類的認知與思維迥然有別。[115]這意味著，至少迄建武五年為止，現今意義上的「經讖」作品必都尚未能發揮影響。

至於公孫述，其「妄引讖記」、「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眾心」時更變本加厲，不僅繼續抓「一姓不得再受命」說事，還為此提出了「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的聖意依據。[116]對此，光武帝一方面就所妄解的「西狩獲麟讖」加以辨正回擊，同時也於百忙中撥冗「講經藝，發圖讖」——該「圖讖」《後漢紀》稱是「河圖洛書讖記之文」[117]。此一記述透露出當前讖緯的發展節點，正處於「六藝經術」與「河洛讖記」對話之際，還待融成「經讖」的階段。而從建武七年朱浮上書為太學「廣博士之選」言及的「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來看，[118]「講經說讖」在太學正規教學課程中甚至很可能是君臣共襄的重點項目。總體上，能看出光武帝認為僅僅回書駁斥並不足夠應對，畢竟「卯金」、「公孫」、「蒙孫」、「塗高」等前引「讖記」固然不難就預言詞句本身駁論，可涉及整個思想體系的經術「學理」卻棘手多了。一姓再興本就有違彼時共識而遭受質疑，孔子為漢赤制的《春秋》歷數亦無法純從「讖記」層面而須兼「經藝」角度作出回擊，則以《河》、《洛》

112 晉・袁宏，〈光武帝紀〉，《後漢紀》，卷 5，漢・荀悅、晉・袁宏著，張烈點校，《兩漢紀》下冊，頁 78。

113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竇融傳〉，《後漢書》，卷 23，頁 798。

114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班彪傳〉，《後漢書》，卷 40，頁 1324；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敘傳上〉，《漢書》，卷 70，頁 4208-4212。

115 說詳郭思韻，〈讖緯、符應思潮下「封禪」體的與時因變——以《文選》「符命」類為主線〉，頁 30-31、33；引文則見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班固傳〉，《後漢書》，卷 40，頁 1377、1378、1384。

116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公孫述傳〉，《後漢書》，卷 13，頁 538。

117 晉・袁宏，〈光武帝紀〉，《後漢紀》，卷 5，漢・荀悅、晉・袁宏著，張烈點校，《兩漢紀》下冊，頁 85。

118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朱浮傳〉，《後漢書》，卷 33，頁 11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讖體系為說闡解經文相為資證，便也勢在必行。

實際上，通過此時班彪〈王命論〉與後來班固〈典引〉的比較，再參校存世「經讖」中諸炎漢符命徵應，可以清晰窺見號稱「孔聖奉天之文」[119]的「經讖」為東漢政權帶來的認知變化與效益。「講經藝，發圖讖」所提供的經、讖對話平臺，直接給予了「赤漢」與經術結合、為孔子所欽定的契機。孔子既有作《春秋》為漢制法之舉，那何妨再進一步，變成奉天為漢制其赤命並且貫通所有經藝呢？那麼僅只《春秋》的斷十二公就遠不足以證漢室歷數。於是我們看到，《河圖》系列中的劉邦得天授圖故事，變成「經讖」諸篇裡孔子代受後為之「題釗表命」[120]，〈孝經援神契〉這一段便是很好的體現：「天乃虹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121]整體來看，「經讖」諸篇在按所隸屬的經藝流別各自牽合圖讖之餘，始終有一顯著的共通立場——致力於「孔為赤制」說的正名、強化、渲染以宣揚炎漢統緒的兼具「天文聖意」，遂特予開國之君赤帝劉邦及其炎漢符應較多篇幅，這既是對赤漢政權的一種鞏固，也能體現光武是在順天遵聖應命「正火德」——對比曾經的水土德之「誤」，而非被視作違背常理的「一姓再受命」。

從內容元素看，「經讖」中的符應類內容、史讖類內容、闡經類內容以及占術與經術的關聯化思路，倘論各自的源流形成，無疑都可分別推溯至更早的年代。[122]但各元素共存融匯成篇——且是數十篇思維體系大致相通者並又深烙共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必然缺不了特定時機官方力量的推動甚至主導，尤其是得以生成的平臺。元始四年王莽為鞏固五德相生體系以替漢新火土傳承張目，遂徵召整合「圖讖」領域，僅僅三年就釋出了可查閱、引據的《河》《洛》著述。建武二年以來，光武帝令尹敏校傳世圖讖，重心本在統一處理過去遺留下「新室承漢」元素，不意遭遇新的危機與需求，導致其決意大力開展勾連經、讖的工程，並且由此定下了正名、強化、渲染跨經科的「孔為赤制」說以鞏固其復興政權的「經讖」造作基調。這使得所謂的校定圖讖，變成需要延長的半開放式項目，從原本可短期完成的整頓舊說——河洛系列，變成尚待更多成品的積累新作——署名孔氏的經讖系列。「六藝」諸「經」與「河洛」諸「讖」的積極對話，以及《圖讖》中的「經讖」著述之迭出，其風當由此大開，在致

119 晉・司馬彪，《續漢書・律曆志》，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志第 2，頁 3026、3039。

120 鄭傑文等整理，〈易緯乾鑿度〉，《兩漢讖緯文獻（上）》，頁 18806。

121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下）》，頁 19521。

122 詳安居香山，《緯書の成立とその展開》（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力納入赤劉天命元素的同時，亦於學理上通過經、讖牽合互釋來使「圖讖享有與經術同等崇高的地位」[123]，並逐漸發展到諸經皆有相應讖書作配的地步。此項工程之大，導致遲至中元元年方得「宣布圖讖於天下」[124]，耗時近三十載，為昔日王莽的十倍。

有關兩漢之際圖讖領域的具體發展歷程，牽扯甚廣，內容亦繁，經已另文處理，便不於此贅複了。

七、結論

就「圖讖」領域的發展來說，《圖讖》諸篇實應被劃為「《河》、《洛》」與「經讖」二支。「經讖」系列的形成年代，學者多一併繫於西漢晚期，但實際詳情仍可商榷。文中從歷時視角，就可體現「經讖」行世問題的若干常用但也常易處理不周的史料，適時結合語料原則、元素，逐項重予審視、辨正，見其形成年代之宜當推遲至建武時期。

西漢晚期相關材料中，李尋「五經六緯」之「緯」的內涵縱使與儒學相關，仍不得與「經讖」直接等同；張霸「百兩篇」《尚書》雖被證偽但流傳未絕，故不得據以論斷採納該說的「經讖」只應成於當時；楊春卿先祖所傳下的「秘記」，乃河洛天文推步之屬，與攀附孔聖經說的「經讖」無關；《華陽國志》所載「漢史案圖緯」求得王延世一段，係「隋唐人妄為竄入」，未能用於推斷「經讖」實情；張衡「《圖讖》成於哀平之際」說所依據的學術推論原則，可用於斷時代上限而不適用於論下限。

新莽至建武早期的相關材料中，《後漢書》「惲據經讖」一句乃范曄就《東觀漢記》原文所作的增飾，同書載公孫述檄所稱引之諸讖緯篇名，亦屬史家取相副者補述；蘇竟的「孔丘秘經」乃就孔子「秘隱」、「藏設」的《河》、《洛》「世表」而言，也即桓譚所抨擊的「或收古之圖書，增益造飾，稱孔子並為讖記」，光武帝駁書所稱引的「西狩獲麟讖」及其讖言即其中的「漢錄」部分；此皆「河洛命紀」預言之流，與《圖讖》中存世「經讖」的內容性質仍有較大差距。

建武早期劉姓天子們紛紛倒臺後，最終餘下的光武陣營，面臨隗囂、公孫述極盡利用一姓複命、《春秋》歷數等讖命元素攻擊主君天命根基，遂在圖讖領域有了新的需求，導致其大力開展勾連經、讖的工程，定下了正名、強化、

123 曲利麗，《兩漢之際文化精神的演變》（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 79。
124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光武帝紀〉，《後漢書》，卷 1，頁 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渲染跨經科的「孔為赤制」說以鞏固其復興政權的「經讖」造作基調，以全方位宣揚光武「正火德」、赤劉歷數未盡的天文聖意。這使得所謂的校定圖讖，變成需要延長的半開放式項目，從原本可短期完成的整頓舊說——河洛系列，變成尚待更多成品的積累新作——署名孔氏的經讖系列。「六藝」諸「經」與「河洛」諸「讖」的積極對話，以及《圖讖》中的「經讖」著述之迭出，其風當由此大開，在致力納入赤劉天命元素的同時，亦於學理上完成經、讖牽合互釋，並最終逐漸發展到諸經皆有相應讖書作配的地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漢・荀悅著，明・黃省曾注，《申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71。
晉・袁宏著，《後漢紀》，漢・荀悅、晉・袁宏著，張烈點校，《兩漢紀》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宋・洪适，《隸釋・隸續》，北京：中華書局，1985。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清・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1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清・王鳴盛，《蛾術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
清・紀昀總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清・皮錫瑞著，吳仰湘編，《皮錫瑞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

二、近人論著

王利器，《新語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
內藤湖南著，馬彪譯，《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任蜜林，《漢代「秘經」緯書思想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安居香山，《緯書の成立とその展開》，東京：國書刊行會，1979。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曲利麗，《兩漢之際文化精神的演變》，北京：中華書局，2017。
艾蘭（Sarah Allan）、汪濤、范毓周主編，《中國古代思維模式與陰陽五行說探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李梅訓，〈讖緯文獻初步形成于漢成帝時期考〉，《齊魯學刊》2013年第1期，頁50-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學勤，〈《易緯・乾鑿度》的幾點研究——兼論帛書《周易》與漢易的關係〉，葛兆光主編，《清華漢學研究》第 1 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頁 12-28。

———，〈《漢書・李尋傳》與緯學的興起〉，《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6 年第 2 期，頁 1-3。

姜忠奎著，黃曙輝等點校，《緯史論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徐興無，《讖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構建》，北京：中華書局，2003。

———，《劉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魯惟一（Michael Loewe）編，胡志宏譯，《劍橋中國秦漢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張震澤，《張衡詩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張西堂，《尚書引論》，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58。

張峰屹，〈歷史維度的缺失——自唐迄今讖緯名義研究之述評〉，《文學與文化》2010 年第 2 期，頁 89-98。

———，〈兩漢讖緯考論〉，《文史哲》2017 年第 4 期，頁 5-24。

郭思韻，《漢代讖緯研究——以淵源流變、內容構成及對文史寫作的影響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傅剛先生指導，2013。

———，〈讖緯、符應思潮下「封禪」體的與時因變——以《文選》「符命」類為主線〉，《文學遺產》2016 年第 2 期，頁 26-35。

———，〈《圖讖中《河》《洛》的內容體系與「經讖」的取資發揮〉，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編，《漢學與傳統文化：第十一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金寶：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2017），頁 43-66。

———，〈讖緯文獻中的「圖讖史」建構及孔子與河洛圖書之關係遞變〉，《淡江中文學報》第 40 期，2019 年 6 月，頁 45-76。

———，〈「天」與「聖」的角力：兩漢之際政權統緒主導下「圖讖」領域的發展與嬗變〉，《清華中文學報》第 27 期，2022 年 6 月，頁 123-178。

陳槃，〈讖緯釋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1 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3，頁 297-316。

———，〈秦漢間之所謂「符應」論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6 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7，頁 1-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早期讖緯及其與鄒衍書說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0 本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8，頁 159-187。

———，〈讖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21 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8，頁 19-42。

陸侃如，《中古文學繫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黃暉，《論衡校釋》，北京：商務印書館，1938。

黃復山，《東漢讖緯學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

———，《漢代《尚書》讖緯學述》，潘美月、杜潔祥主編，《古典文獻研究輯刊》4 編第 11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

詹鍈，《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楊權，《新五德理論與兩漢政治：「堯後火德」說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

廖平，《經話》，成都：巴蜀書社，2019。

鄧安生，《蔡邕集編年校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劉明，《漢代《春秋緯》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王長華先生指導，2010。

鄭傑文等整理，《兩漢讖緯文獻（上）、（下）》，董治安主編，《兩漢全書》第 33、34 冊，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